

陈独秀早期国情观探析

刘 艳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摘要]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的决定性因素。早在青年时期陈独秀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与这两者的矛盾突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陈独秀在接触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开始不再排斥社会主义,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将救国的根本出路放在国民性的改造上。

[关键词] 陈独秀; 中国基本国情; 中国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4-0077-04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基本国情的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在青年时期对中国的社会现状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认为中国处于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民与这两者的矛盾突出。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但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开始不再排斥社会主义,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将救国的根本出路放在国民性的改造上。

—

新文化运动之前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主要倾向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依我说现在的国势,朝廷官吏,虽说还在,国却算是世界一个亡国了。”^[2]^[42]陈独秀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应当兼具“土地”、“人民”和“主权”三要素。而当时的中国国土被帝国主义侵犯,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压,主权也面临帝国主义的侵蚀。陈独秀在1897年《扬子江形势略论》中分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意图,“近时敌鼯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粤,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2]^[10]。1903年陈独秀在安庆发表《安徽爱国演说》,并成立“安徽爱国会”,控诉俄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之“横暴无

礼”,中国人民“时被淫略者,更言不胜数”。次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以帮助人民群众“通些时事”,用通俗的语言,尖锐生动地揭露和批判了列强瓜分中国和封建制度的种种罪恶。

在《论安徽的矿务》和《亡国篇》中,陈独秀揭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认为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经历了一个由经济上的侵入到政治或军事上的占领过程。“他们洋人,占人家的土地,灭人家的国度,其先总是哄着那些地方的官民开采几处矿山。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既开矿山,又造铁路,那两下交涉的事体,自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只要两下里有个参差,那洋人必定藉保护商务为名,调些洋兵来驻扎矿铁路、左近。”^[2]^[22]针对这种侵略方式,陈独秀警醒安徽乃至全国人民,“依我看来,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要紧的事”^[2]^[23]。

虽然《安徽俗话报》创办和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在主持《安徽俗话报》期间,陈独秀对中国的国情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分析。陈独秀认为如果在先前帝国主义还是“意图”瓜分中国的话,那么在俄国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则是帝国主义纷纷荷枪实弹地来分享中国这个“肥羊尾巴”。至此,陈独秀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清政府是“奴才本性”,对洋人只会“干爹奉承”,“怕不怕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3]。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一千人等组织“岳王会”,开始走上暴力反清的道路,两年后

[收稿日期] 2013-07-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中国共产党基本国情认识的历史考察与经验启示”资助(编号:11JD24)

[作者简介] 刘艳(1987-),女,湖南望城县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

“岳王”会瓦解。

对造成中国社会殖民地半殖民地现状的原因,陈独秀认为这与落后的国民性有关,“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好歹转移。我国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2]53}。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国民性中缺乏基于真正“国”的意识上的爱国心,缺乏“尽人力”的自觉意识。“国人无爱国心,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其国亦殆。二者具无,国必不国。”^{[2]67}但这种爱国心和自觉心的缺乏又与封建思想的束缚密切相关。国家成立的目的应当是“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而中国的封建王朝所谋获的只是一家一姓之兴衰。所以陈独秀在批判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对封建恶俗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在这里,陈独秀将国民性的改造视为当时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因为在当时国民性未被开发,爱国心和自觉心未被撬动的情况下,无论是要建立共和制还是恢复帝制都是不可能的。“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就瞽者无见,与以膏炬智力,适无者而增扰耳。”^{[2]71}可见,此时陈独秀对封建毒瘤势力的认识和批判主要是集中于思想文化领域。

二

面对中国这种“外迫于强国,内逼于独夫”的局面,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扬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127}。期间,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主要倾向于封建、半封建性,把攻击的炮火集中对准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落后意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甚至残害民众,这样的民主共和国,“执爱国之肤见,卫虚民之残体”^{[2]71}。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山河日下。“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具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魁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2]66}

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4]27},对救国道路有了新的阐释:一方面,他发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并不适应于中国,而且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也并非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开始留心社会主义运动。“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

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也。”^{[2]80}“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2]80}然而,即使陈独秀发现了社会主义这种新的选择,但他认为这种革命方式的应用需要“根于天性,成为俗也”的良好的国民性。由此,我们发现陈独秀仍旧将国民性的改造视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根本途径。“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恩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2]93}“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2]93}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展,陈独秀开始关注国际局势,并开始将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之联系考察。1916年初,陈独秀分析指出,国际局势经受一战的洗礼,“大异于前”,号召中国人民“当此除旧布新之除,理应从头忏悔,改进自新”^{[2]102}。但陈独秀的这种“改进自新”仍是针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而言的,“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2]102}。陈独秀还在此期间首次提出“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指出中国政党政治运动的最大局限就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之根本进步,必无与焉。”^{[2]104}陈独秀仍旧将民主共和制的实现归结于国民的醒悟,他认为中国人探求救国的道路经历了由学术至政治进而伦理的探索,“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2]109},而伦理的觉悟是中国人“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开始关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2]114}。在这里陈独秀将眼光转向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在社会改造路径上选择经济的根本改造打下一定的基础。

1917年6月,陈独秀发表《时局杂感》,主张进步党与国民党合作,实现国家统一,“消除此自古与国家不能两立之叛将骄兵”。同时,他还认为要实现民主共和必须先打到张勋、倪嗣冲之类的封建军阀,“欲存国家,必去此凶顽。去此凶顽,然后财赋可理,政令可行,学可兴,国可保,然后始有共和可言,不然不但共和必无幸,国家之危且如系卵”起

来^{[5]319}。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危机感,7月陈独秀在《答顾克刚》的信中,改变了《新青年》不谈政治的宗旨,“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色彩,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4]180}又说《新青年》的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家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4]180}《新青年》的这种转向,意味着陈独秀的目光从文化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同时也是其国情认识视角的转变,从文化层面下沉到政治层面,使其开始触及基本国情——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社会发展阶段。这种转变是陈独秀开始由国情的认识,进一步深入至基本国情的表现。1918年底,他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使新文化运动与政治斗争更为紧密地联系。

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陈独秀重新将眼光转向中国的政治局势,认为中国的政治局面是“两团政治”,“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更可怕”^{[2]305}。一方面,在大革命失败后迅速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阀势力越来越愈大,造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开始与地方军阀相勾结。“两团政治”是陈独秀对封建专制势力和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概括,也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形象概括。据此他提出的中国政治革命有了对外独立和对内民主的双重要求:一是对外要求人类平等主义,要求欧美人抛弃歧视有色人种的偏见;二是,对内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但是,在具体如何实现这种政治革命的途径上,陈独秀实际上还是主要倾向于非暴力革命的手段,寄希望于非一党势力来统一国家,甚至妄想劝说各派军阀放弃武力政治,实行“北洋、国民、进步党平分政权的办法”^{[2]269}。同时,尽管陈独秀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了解不多,但也肯定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5]364}

三

同诸多有志之士一样,陈独秀也希望中国可以借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时机扭转中国的局势。但是帝国主义的反应使得陈独秀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彻底破灭。其发出疑问,“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5]475}陈独秀放眼世界局势指出,海洋自由的问题、国际联盟的

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大强国一手秘密包办,而弱小国家的权利问题和民族自觉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它们的议程。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中,陈独秀分析了“上海的和会”和“巴黎的和会”的实质,是“两个分赃会议”。这种认识,一方面使得陈独秀不再对封建军阀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抱有任何的幻想;另一方面在这种公理不能战胜强权的事实面前,陈独秀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态度上开始倾向俄国十月革命。在《公理何在?》一文中,陈独秀为十月革命做了公开辩护,这表明陈独秀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和帝国主义瓜分狂潮重新袭击中国的背景之下,陈独秀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苏俄的社会主义民主进行反思和比较。“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2]422}陈独秀指出,十八世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要求权利的旗帜,而二十世纪的民主则应当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在这种反思和比较之下,陈独秀决心放弃宪政和政党政治。陈独秀认为在“两团政治”之下,“根本的救济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2]411}。这些“平民”主要包括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和劳工团体。至此,陈独秀所主张的革命方式是国民革命,其所主张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了,而是具有了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治”政府。

同时,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陈独秀认识中国国情的角度也逐渐由政治层面下沉到经济层面,“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6]正是因为视角的下沉,陈独秀开始关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底资本固然还没有集中到工业上,但是现在已经起首了”^{[2]527}。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没有欧、美、日那样发达,但中国产业界已经有了纯粹资本作用,出现了“资本制度”社会经济组织和“财产工商阶级”。有鉴于帝国主义国家劳资关系的恶化,陈独秀开始重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劳工问题,号召工人起来“劳力者治人”。1919年4月期间陈独秀对北京的居民状况做了一次调查研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贫民的哭声》。文中,陈独秀认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渐突出,“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

题。”^{[2]385}中国也不独外,中国的无产阶级穷困潦倒、连衣食都没有,能给资产阶级当牛做马都是一种福气。他警告那些不劳而获的反动统治阶级,听不到贫民的哭声,最后也要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

根据这些认识,陈独秀提出了“改造社会三方法”:其一,“打倒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其二,“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其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7]。这表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希望用经济改造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他也开始反思盲目崇拜西方的观念,明确表示不想走资产阶级的道路。“像现在个人的工业,牺牲了无数的穷苦工人,利益都集中到少数的资本家个人手里”,这种情况下所建立的国家是“少数资本家独有的社会国家”,是“多数工人除外的社会国家”^{[2]526}。但是,陈独秀在改造的途径上却不希望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失,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

总之,在转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陈独秀对中国的国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同时开始触及基本国情的主要内容。虽然,陈独秀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机或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或重于封建半封建性质,但其认为中国处于“两团政治”之下(即认为中国是在“督军团”和“外

交团”)的表述在总体上不自觉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虽然没有认识到造成中国贫困落后的总根源是帝国主义,但陈独秀在实质上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还看到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勾结的一面。在社会改造的根本任务这一问题上,其主张在改造国民性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重目标的内容虽有幼稚之处,但其方向却是正确的。而在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问题上,陈独秀虽仍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但这种民主共和国却具有了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性质,同时他也不排斥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
- [2]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3] 王光远.陈独秀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
- [4] 水如.陈独秀书信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 [5]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6]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7] 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N].晨报,1920-02-11.

Chen Duxiu's Views on Early Conditions

LIU Yan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s is a decisive factor in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hen shows great concern for China's social status. He holds the idea that China is under the rule of the feudal warlords and imperialism.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eudal warlords and imperialism is prominent. He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public. Chen in the process of contacting with non-Marxist socialism begins to be no longer exclusive, but he puts the nation's fundamental way o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the transformation. In contact with Marxism Chen begins to accept socialism, but he wants to save the countr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Key words: Chen Duxiu;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Chinese revolution